

明清时期有关华侨华人的 典籍笔记和研究概述

李安山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 北京 100871)

[关键词] 明清时期; 华侨华人; 典籍笔记; 研究概述

[摘要] 本文是对明清以来中国学者关于华侨华人研究情况的述评。作者认为, 虽然这些著述主要以描述和记载为主, 但由于这些著作均对本人的亲身经历或调查记录, 其史料价值远远高于研究价值。作者对梁启超在华侨华人研究方面的开创性成果给予高度评价, 并对梁氏1904年提出的“华侨殖民论”进行了分析

[中图分类号] D634. 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5162 (2002) 02 - 0041 - 07

A Historiographical Survey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during the Ming-Qing Period

LI An-shan

(Institute of Afro-Asian Studie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100871)

Key words: Ming-Qing period; Chinese overseas; historiographical survey

Abstract: The article is a historiographical survey of the study by Chinese scholars on the Chinese overseas during the Ming-Qing period. The works during the time are mainly reminiscences, memoirs or records, and usually more descriptive by nature, but their value as historical data is very important. The author also analyzes Mr. Liang Qichao's theory of "Chinese migration as colonization" and thinks highly of Mr. Liang's pioneering study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华侨华人研究在20世纪曾四次引起学术界的兴趣, 这均与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发展有密切关系。20世纪初, 由于1904-1910年英国在南非引进契约华工开采金矿及美、澳等国的排华运动, 华工的待遇、引进华工对本地的影响及定居国的移民政策等问题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兴趣。^[1]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劳动力奇缺, 大批华工涌入欧洲。他们的地位、相关的国际法问题以及中国政府的相应政策又一次引起学术界的关注。^[2]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由于亚非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崛起, 国际政治学领域(以美国学者为主)兴起了对各国少数民族的研究热。华人存在于世界各地这一事实、“冷战”气候以及50-60年代东南亚国家的“排华”现象更引起了世人关注, 华侨问题又一次引起学者的重视。^[3]从80年代起, 中国经济的崛起成为一大奇迹, 海外华人所起的作用显而易见。华侨华人再次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4]

[收稿日期] 2002-01-08

[作者简介] 李安山, 男,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教授, 主要从事非洲华侨华人史研究。

中国学术界对华侨华人问题的关注始于清末，民国时期有盛有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经波折。1978年以后，华侨华人研究重新开始，短短二十余年，华侨华人研究得以长足发展。本文拟对明清时期有关华侨华人的典籍笔记进行大致梳理，重点介绍梁启超的有关著作及其观点，最后就明清华侨华人著述的特点提出自己的看法。

中国人移民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已有相当历史，自秦汉到唐宋，由行商到住商，加上元明逃避战祸的难民，构成了早期华侨的主体。明代的典籍（正史和游记）对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多有记载。《明史 外国卷》记载华人逐渐深入菲律宾内地定居，“先是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明代曾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费信和巩珍回国后分别写成《瀛涯胜览》、《星槎胜鉴》和《西洋番国志》，详细具体地描述了爪哇岛北部、苏门答腊南部和加里曼丹西部等沿海地区中国移民村落的生活情况。华人在当地已有一定势力，并在不同程度同化于当地社会。明代福建漳州人张燮的《东西洋考》记载了17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对侨居马尼拉的华人进行的一次大屠杀以及华人与菲律宾人民共同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英勇斗争。姚楠先生认为这是我国关于西方殖民者迫害海外华人的最早记录之一。

到清代，关于海外华人的记载更多，包括船员的口述和游者的记录，还有外交官员的笔记。由谢清高口述、杨炳南（一说吴兰修）笔录的《海录》（后由冯承钧作注，名《海录注》）较为著名。谢清高（1965 - 1821）为嘉应州（今广东梅县）金盘堡人。18岁时即随外轮出洋，在海上共14载，遍游从越南到西北沿海的一带地区，31岁时双目失明。《海录》较详细地记载了18世纪后期华人在上述地区的垦殖、采矿、商业活动。王大海的《海岛逸志》（约1791）较详细地记述了爪哇地区华人的生活风尚。王大海为福建龙溪（今龙海）人，1783年到爪哇，侨居多年，游踪几遍其北岸诸港。书中所记皆为作者亲身经历或亲眼目睹。因此，《海岛逸志》成为研究东南亚华侨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陈洪照（1710 - 1773）的《吧游纪略》是一部描述18世纪中叶南海交通、印度尼西亚（爪哇）及华侨的中文著作，约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主要介绍了南洋一带的交通、疆域、印度尼西亚的气候、贸易、人物和风土人情，从而为研究清初南海交通史、华侨史及当时的印度尼西亚史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遗憾的是，此书至今未见原本，惟在朱仕玠著《小琉球漫志》中，多处摘引该书原文，近三千字。此外，香港陈佳荣曾著《陈洪照 吧游纪略》，对该书进行研究。^[5]就侨居地而言，也有一些华人的记录。最早一本由华侨记载华侨自身活动的专书是关于印尼吧城（今雅加达）的《开吧历代史记》。它以编年体例详细记载了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爪哇华侨的重要活动。还有一本题为《兰芳公司历代年册》的专书，记载了18世纪中叶华人罗芳伯等在西加里曼丹开发金矿、建立行政组织的活动以及他们与荷兰殖民者抗争的事迹。

晚清政府曾派遣一些外交官出外任职或出国访问，他们的笔记真实地记录了途中所见海外华侨的情况。同治五年（1866年），张德彝奉命往外国游历，途经东南亚一带，回国后写成的《航海述奇》记录了越南、新加坡等地旅居华人的情况，文中提到一些华人商栈酒楼如“宏泰昌”、“胜芳楼”、“醉香楼”等，在安南时“乘小舟回船时，月色朦胧，轻舟飘荡，清风徐徐、水虫唧唧。两岸华人，哗拳饮酒，打鼓吹笛，土人高歌，鸡人击柝，宛若故乡。”郭嵩焘在《使西纪程》中也有关于东南亚华侨的记述。在槟榔屿，“居民十四万，闽广人十万有奇。”志刚的《初使泰西记》中提到加利福尼亚的华侨约有8万到10万，“其中在旧金山居住的大约为一万五千到二万人，他们有些人在这儿已建立了重要的商号，名声极好。人们赞扬他们的诚实、智慧和学习欧美经商方法的敏捷。他们进口丝、茶和古董。”薛福成在出使日记中则记载了华侨华工在澳洲的情况。此外，刘锡鸿、曾纪泽、蔡钧、张荫桓等晚清职业外交官对东南亚、日本等地的华侨生活也均有描述。这些游记的特点是真实，但对所记资料选择性较强。^[6]

19世纪后半期，中国开始对英属殖民地和美国输出契约华工。当时，美、英、法、西等国的代理商以香港为基地，在华南沿海地区散发传单和图片，诱骗中国人去国外当苦力。1847年即有华工被“招请”赴美国。与此同时，一批靠欺骗拐卖为生的无耻之徒也应运而生。他们以各种手段拐卖人口出洋。同治十二年（1873），《申报》发表题为“戒拐贩人口出洋论”的社论，嘱平民提高警惕，“业贾操农，勿作希冀之幻想，”安份守己；对“居心奸险，立志凶狠，惟知己，射利归囊，专以贩人出洋为业”的“猪仔头”提出谴责。^[7]

由于国内外舆论对在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做工的华工的境况颇有微词，清政府于同治十二年（1873）派出以陈兰彬为首的政府调查团，到古巴调查契约华工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调查是以提问的方式进行的。为了解具体情况，调查团向华工提出各种问题共50个。这些问题包括华工来古巴前后的各个方面，如籍贯（古巴从何地招募华工？），合同（他们是否签过合同？华工在合同中的位置？违约者如何处置？）以及婚姻、分布、健康、死亡等情况。接受调查的华工们的回答真实反映了华工在古巴的悲惨待遇，也充分体现了华工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奋力抗争的精神。陈兰彬的报告书《古巴华工口供册》现存国家图书馆（共四册），其英文版于1993年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除此之外，真实记载古巴华工的另一重要史料是谭乾初的《古巴杂记》（光绪丁亥年）。他于1879年任清朝总领事出使古巴中记载了12万契约华工在古巴的惨状，“稍有违命，轻则拳打足踢，重则收禁施刑。或私逃隐匿则致这死地，或交官工所发售。”“各埠中，瞽目残疾华人丐食者甚众。”^[8]容闳在他的《西学东渐记》中也提到华工的悲惨境遇。

到清末，有的学者或任职于毗邻国家，或任教于东南亚地区，有机会接触当地华侨，对华侨问题渐生兴趣，他们对华侨的境况及当地风情已有进一步了解。李钟珏的《新加坡风土记》是一部关于东南亚华侨生活的早期记载。李钟珏（1853-1927年）为清朝政府外交官员，曾任中国驻新加坡领事。1887年他赴新加坡游历两个月，后根据自己的观感写成《新加坡风土记》。该书主要记述新加坡地理特产、风俗习惯及人口，对英国在新加坡的统治制度亦有涉及。作者还记述了当时颇为盛行的苦力贸易（或“猪仔贸易”）和“猪花”以及英国殖民者诱惑华侨吸毒、赌博的情况。这部游记为研究英国统治时期的新加坡及当地华侨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该书由其族弟江建霞收入《鹤阁丛书》中出版，后商务印书馆收入《丛书集成》初编。^[9]

《客韩笔记》（1906）是清廷驻韩官员许寅辉在韩期间的见闻笔记。1893年，许寅辉应驻韩英使之聘，赴韩办理文案兼翻译。后因中日关系恶化，战争骤起，清朝官员回国。他一人驻韩，“爰节录是时事迹，而为笔记一卷”。此笔记起于甲午（1894）正月，止于乙未（1895）8月，“盖亦安不忘危之意云尔。”作者在书中叙述了旅韩华商的悲惨境遇及自己与陈德济致力保护华商生命财产的经过和一些华人在国难当头仍然寻欢作乐的行径，并真实记录了清军溃败后向华商寻求庇护却在得到初步安置后出外滋事的事实。1895年，作者回国途中经日本长崎、横滨、神户和东京等地时，仍细心观察当地华商情形。此书是研究19世纪末旅韩华商的重要资料。^[10]

在20世纪初，由于中外交往的频繁，信息量的增加，特别是契约华工在世界各地的悲惨遭遇引起了国人的注意。在各种报刊上出现了关于华侨华工的报道和介绍。创刊于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1902年1月）的《外交报》为旬刊，共出300期，停刊于1911年。该报的三个栏目中均有关于华侨的报道和资料，即“文牒”、“译文一类”和“交涉录要”。“文牒”一栏刊载各种官方文件和重要的法令、通告，其中即有关于华侨的法令。每期还有大量的译文，主要译自英、美、日等地的重要报刊。译文分为三类，“译文一类”主要是关于中外关系和各国对华政策方面的讨论，其中有不少关于华工的招募、待遇和政策的外论文章。大部分《外交报》还列出“交涉录要”一栏，其中又辟有“华工纪闻”或“华侨纪闻”的栏目，刊登各地有关华侨的情况。

此外，耶稣教会在上海成立的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以及由维新派创办的刊物如《新民丛报》、《清议报》、《时务报》和《知新报》等报刊也刊载关于华侨的报道。1899

- 1900年间檀香山华人聚居区多次被焚的事实、美国排挤和歧视旅美华工的情况、南洋华侨的境况及南非华侨的悲惨境遇在这些报刊上均有报道。有的文章已经提出了保侨华侨的问题。创刊于1904年的中国研究国际问题的重镇《东方杂志》刊登过一些较有份量的文章。在英国政府决定从中国引进契约工人以解决南非金矿劳工短缺问题以后，该杂志在第一卷的第7、8、10号均有2-3篇关于南非华侨的文章、文件或报道。此外，《东方杂志》还辟有“各埠华侨近闻”的专栏，报道各地华侨的情况（如奖励华商、侨民兴政、侨商自治、侨民尚武等）。在第四卷第10号（1907年）刊登了华侨人口统计。这大概是最早公开报道的华侨人口统计数字。这些有关文件、通讯和报道既说明华侨问题已成为中国与外国政府交涉中的一个因素，同时也表现了国民对华侨问题的关注。然而，这一时期尚无对华侨问题的研究。

1880年，美国政府迫使清政府签订了限制华工的《北京条约》，为歧视迫害华工提供了法律依据。1904年，《北京条约》期满，美国政府再度要求续订，遭到在美中国人的强烈反对，国内也奋起响应。在1905年发生的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中，国内出版了一批关于反美华工禁约的著述，以文学著作为多。^[11]有关政论中最有影响的是梁启超的《记华工禁约》（1904）。同年6月，该文以单行本出版，改书名为《美国华工禁约记》。此外，流传较广的还有《广劝抵制美约说》（1905）、《中国抵制禁约记》（1905）、《美国华工禁约纪事》（1905）、《中美禁约全书》（1905）、《檀香山华工受虐记》（杭州白话报本）和支那自愤子的《同胞受虐记》（1905）等。

梁启超可以说是清末民初报道和关注华侨华人（包括留学生）问题的主要学者。他通过在日本出版发行的《新民丛报》刊登了一些关于华侨华人的研究文章、报告书和通讯。有的是反映华侨华人在海外的悲惨遭遇，有的反映留学生在国外的艰难生活。^[12]当时，在国外的留学生时刻关注着国内局势，对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各种侵权举动十分留意。例如，光绪三十年（1904），在日本东京留学的四川学生为川汉铁路事向全蜀父老致书，在美国的留学生就粤汉路权事致信国内，揭露西方列强的阴谋。^[3]梁启超本人也就华侨问题发表文章或政论，这些著述有相当部分后来收入他的文集（主要是各种版本的《饮冰室文集》）。《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光绪三十一年发表于《新民丛报》63期上，后以单行本出版）可以说是中国华侨研究的开始。作者介绍推崇的八大殖民伟人为三佛齐国王梁道明（明代，南海人）、三佛齐国王张璉（明代，广东饶平人）、婆罗国王某（明代，福建人）、爪哇顺塔国王某（广东潮州人）、暹罗国王郑昭（清代，广东潮州人）、戴燕国王吴元盛（清代，广东嘉应人）、昆甸国王罗大（清代，广东嘉应人）、英属海峡殖民地开辟者叶来（指叶亚来，1837-1885，广东嘉应人）、另附菲律宾寓侠潘和五（明代，福建人）。^[14]

这一著作的问世有三重意义。第一，它标志中国学者开始对华侨历史作用的认识，这是作者在认识世界历史的同时开始对中国自身历史的反思。此文也是中国华侨研究的首创之作。第二，作者从现代历史的角度出发，将华侨与开拓殖民联系起来。作者通过对哥伦布、利文斯敦等西方探险家的认识，认为中国的殖民者在毫无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殖民邻邦，远比西方殖民者伟大。第三，作者在论述八大伟人的同时，对殖民与国力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海事思想与国民元气关系密切，此其一。中国在今后的殖民活动中要充分利用粤闽两省的优势。殖民事业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此其二。“列强殖民，莫不以政府之力直接间接奖励之。”中国却反其道而行。政治能力与国际竞争关系密切，此其三。这实际上是梁启超历史哲学的阐发。作者有感而发，“八君子之见摈于中国历史，其毋乃即中国民族见摈于今日生存竞争界之表征也。吾述此，吾有余痛焉耳。”作者认为，“海以南百数十国，其民口之大部分，皆黄帝子孙。以地势论，以历史论，实天然我族之殖民地也。”“华侨殖民论”即自此始。

梁启超的《美国华工禁约记》（1904）是清末中国学者第一部涉及美国华人的著作。该书分为五章。第1章“其历史”对加利福尼亚华工的历史及美国政府有关华工的各种禁例进行了历史概述。第2章“禁例”对各种禁例进行了分析，其中包括1882-1903年期间的11项禁例的略表，

对各种禁例的分类，华人之有入美权利者，华人入境之限制，对于游学者、商人、注册华工和外来籍华人及临时过境者等各种类型人员之苛禁。第3章“旅美华人人数统计”对美国各地华人进行了大致统计。他通过采访当地华人老者，确定“南北战争之时（1860年），华人始有至者。”华人最多时约30余万人（1883年）。1902年统计资料表明，美国共有华人128060人（不含菲律宾群岛，统计有误，应为128050人），此数包括美国本部（98863人）、檀香山（25767人）、阿拉斯加（3116人）和海陆军所雇用者（340人）。其中西部十一省华人约67929人，占美国本部华人总数的2/3。^[15]第4章为“美人排斥华人之论据”。当时美国人曾在纽约一家英文报刊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禁逐华人之原理”的文章，主张禁止华人入境，文中提出二十条理由。当年在耶鲁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张煜全将此文译出后在旧金山的华文报纸发表。梁氏将此文大致整理，并加上按语。禁止华人入境的理由大致可分为三类：经济因素（赚钱后寄回中国、与当地工人就业的关系等）、社会因素（道德水准、吸鸦片及社会治安等）和政治因素（可破坏美国民主制等）。在此章中，梁氏提出两点公允之论。一是华人必须改正陋习以适应当地风俗和道德水平；二是美国人中也有持不能禁华人者。第5章为“华人对于禁约之运动”，全文登录了当时全美华人为反对苛例而向中国政府部门提交的请愿书及其附件。这一请愿书曾由“美属百数十埠十余万人联名上递”，“沥诉苦况，以求政府官吏之助力”。此件共递交中国政府七个部门。本章还提到檀香山的华文报纸《新中国报》总撰述陈仪侃之建议：不可仰鼻息于政府，惟我民以自力抵制之。他提出可以抵制美货为武器，不用、不买、不运美货。此书最后还附有“美国现行工商部禁例新章”，计30页，61款。该书堪称中国学者对美国对华人移民政策较系统的阐述。^[16]

梁启超曾在北美游历多次，其海外游记对当地华人情况予以特别关注。《海外殖民调查报告书》是关于加拿大（特别是英属哥伦比亚省）华侨华人的著作。该报告书分为六个部分。他在前言中写道：“余去国以来，航海游白人殖民地者凡三次。”“此行目的，一以调查我黄族在海外者之情状，二以实察新大陆之政俗。”第一部分主要概述加拿大全境华侨华人的总数及其分布情况。第二部分分析了加拿大华人的职业，特别是从事渔业的华人，并与在加拿大从事渔业的日本侨民进行了大致的对比。加拿大对华人有各种限制，“限华人非已入英籍者不午采渔。故虽以此区区之利权亦不行与他族竞。制业鱼业之外。”因此，日本人多从事采渔业，而华人在此多为制鱼。第三部分分析了英属哥伦比亚省华人从事的商业情况。他提及的两点表现出他细微的观察能力。一是华人的赌博习惯，开赌铺的有，赌博的更多，“几于无家不赌”，连日本人也参与进来。二是通过与日本人进行对比，他认为华人的经商能力极强。然而，“华人商务之天才，只能牟本国之利，只能牟东方人之利。然与欧美人相遇则挫败，则有此天才而不知扩充故也。”第四部分专门论述了各地限制华工的法令。除英属哥伦比亚省限制华工的登岸税金外，他还介绍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对于入境限制华工的各种苛例。他认为大部分华工之所以在加拿大登陆，主要是将此作为跳板，以“偷过界以入美境也。”第五部分阐述了华人最早来此地的历史和华人儿童的入学情况。第六部分则是关于当地华人组织维新会（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的，作者特别对其选举及运作过程进行了介绍，认为“其所怀抱之政府，俨然与文明国之政党无异。此诚中国数千年所未有也。”^[17]

此外，他的海外游记《汗漫记》对檀香山的华侨情况进行了介绍。该地有华人约二万人左右，“而热心国事、好谈时局者，殆十而七八。风气之开，冠于海外各埠。”他还就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问题进行了各种报道和评论。他将留学生称之为“最敬最爱之中国将来主人翁”，并对留学生提出了“天职”问题，“人之天职，本平等也。然被社会之推崇愈高者，则其天职亦愈高，受国民之期望愈重者，则其天职亦愈重。”他对留学生寄予厚望，指出当今留学生之天职，“不徒在立国家政治之基础而已，而又当立社会道德之基础。诸君此之不任，而更望诸谁人也。”^[18]

清朝末年华侨史研究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羲皇正胤（易本羲的笔名）所著《南洋华侨史略》

(1910)。该文首先发表在东京出版的《民报》第 25 - 26 号。作者在南洋任教职期间，目睹华人后代对华文一字不通，颇有感触，“戊中疾剧，遄返扶桑，于病骨支离之际，勉辑是书，冀或有以表彰我侨南汉族千百年光荣悲惨之历史于天下……”该著作共分 9 章，分别论述了华侨南渡之起源及唐宋交通诸番之盛、宋遗臣亡命及元征爪哇之原因、明代远略及华侨之发达；郑成功独立台湾及漳泉惠潮人之遁逃、海禁、华荷血战及荷政府虐待华侨之原因、客人南渡与洪天王之关系、华侨之膨胀力、清政府现今笼络华侨之原因及结论。从各章标题即可以看出，作者意在对华侨移民海外作一历史的考察，以填补华侨历史研究之空白，引起国人对南洋华侨的认识。此著作文字虽然不多，但很有份量，在华侨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当时主张将“华侨移民”等同于“殖民”的观点或意见还可以从其他文章中看出，如《选报》第 44 期上刊登的“中国殖民之政略”反映了同样观点。

梁启超的“华侨殖民论”可以算是清末出现的第一种关于华侨地位和历史作用的理论，其内容大致包括以下三点。首先，梁启超将文章的标题定为“殖民伟人”，说明他认为华人的移民是一种与西方近代殖民主义相同的现象。他不仅认为这种殖民事业合法合理，同时他认为中国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华侨殖民论”的核心。其次，他认为中国人的殖民事业是十分光荣的，能做到这一点的中国人都是伟人，是民族的骄傲。殖民事业与国力紧密相连，应得到政府的奖励和社会的支持。再次，不论是从人种上、地理位置上，抑或是从历史上而言，中国东南部诸邻邦均是中国天然的殖民地。因此，中国政府应该保护华侨的地位，承认在海外的华侨社会为中国的殖民地。20 世纪初，晚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百孔千疮，百日维新的失败使中国学人对满清已失去信心，面对西方列强蹂躏下的中国痛心疾首。“华侨殖民论”可以说是中国学者面对列强的挑战时表现出来的一种民族主义意识，虽然在理论和实践上均不可取，但对民国时期研究华侨问题的一些学者（如胡绍南、易本羲、温雄飞、刘继宣和束世澂及李长傅等）有相当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明清关于华侨问题的著述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大部分著述为关于旅居国外的华侨的报道，包括华侨受歧视和虐待的情况，各国限制华侨的苛例，还有的涉及华侨的社会生活（如提倡办学等）。第二，这些报道大部分为随笔、游记、感想或杂记，或平铺直述，或夹杂个人的看法和意见，均为撰稿人对华侨问题的兴趣所致，是一种描述性的作品。除个别著述外，尚无客观的研究成果。第三，资料性强。正因为这些著述多为华侨本人、华侨调查员或外交人员所写，均为本人的亲身经历，这些报道为后来研究各国华侨和各国的华侨政策提供了资料。可以说，这种对华侨问题的兴趣与中国的国力和外国对华侨的政策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资料的选择性很强，参杂的作者个人的偏见也颇为明显。第四，梁启超对华侨华人的重视和研究功不可没。他利用所办的《新民丛报》尽量报道海外侨胞的有关信息，对华侨所在各国的苛例进行揭露和评价，同时还对北美等地的华侨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他的热心既与一个关心中国国势和国民的近代知识分子先驱的敏锐观察力有关，同时也是在与西方列强碰撞的过程中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民族主义意识逐渐形成的表现。“华侨殖民论”是这种民族主义意识的典型。

[参考文献]

- [1] T. Naylor, *Yellow Labour: The Truth about the Chinese in the Transvaal*, London, 1904; Jacques Amyot,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Manila*, Chicago, 1906; Mary Coolidge, *Chinese Immigration*, New York, 1909.
- [2] Chen Ta, *Chinese Migration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 Office, 1923; P. G. Campbell, *Chinese Coolie Emigration to Countries within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1923; H. F. MacNair, *The Chinese Abroad*, Shanghai, 1924.
- [3] 美国学者斯金纳关于华人同化的理论对华侨华人研究的影响至为重要。参见 G. W.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New York, 1957;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Thailand*, New York, 1958.
- [4] 参见 Ronald Skeldon, “The Last Half Century of Chinese Overseas (1945 - 1995):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9: 2 (Summer 1995).

学术动态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安山博士于 2002 年 4 月 16 日晚在位于旧金山的美国华人历史学会作了题为“非洲华人史”的讲座。他主要谈了四个问题：华人移民非洲的早期历史；非洲华人的社会经济活动；非洲早期的契约华工和非洲华人的一体化过程。他认为，华人在非洲定居的经历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创业谋生、奠定基础、逐步适应和一体化。研究美国华人的权威麦礼谦教授和胡垣坤教授到场并参与了讨论，前来参加讲座的听众中还有从南非移民美国的华人。李安山教授讲完后，听众提出了多个问题，诸如非洲华人的融合问题、台湾与非洲的关系问题等。美国华人历史学会向李安山教授赠送了礼物。美国华人历史学会成立于 1963 年，是全美最早成立，也是规模最大的致力于美国华人研究的学术组织。作为曼隆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的访问学者，李安山教授在四个月的短期讲学中曾在斯坦福大学和华盛顿大学作了同样专题的讲座。（静水）

2002 年 5 月 10 日 - 12 日，题为“从全球和地区角度看亚裔美国人”的关于亚裔移民社群的国际研讨会在旧金山召开。会议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亚裔研究系主办，其主旨是对美国亚裔移民社群的历史、现状、各种联系以及他们与祖籍国的关系进行探讨。大约有 100 名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的论文涉及在美国的各种亚洲移民社群，如华人、日本人、韩国人、菲律宾人、越南人、缅甸人等，可谓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关于移民美国的各种亚裔社群的学术研讨会。会议不仅大大促进了对美国亚裔移民的学术研究，同时对了解各亚裔移民社群对美国社会的贡献和加强各亚裔社群之间的联系将起到重要作用。这一会议必将大大推动美国社会对亚裔移民的了解，也将有利于亚裔移民社群争取各种正当权利的运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著名华人学者王灵智教授是这次会议的组织者。提交会议的一些优秀论文将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安山）

- [5] [9] 周南京. 华侨华人百科全书 著作学术卷 [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1. 12, 246, 257, 505.
- [6] 这些资料均收入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华侨史资料选辑组编. 晚清海外笔记选 [M].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83.
- [7] 转引自阿英. 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575 - 577.
- [8]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华侨史资料选辑组编 [M]. 晚清海外笔记选 [C]. 222, 223.
- [10] 同上, 第 249 - 250 页。此书现存庐山图书馆.
- [11] 阿英编《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中收集了这方面的资料.
- [12] “南非洲华侨惨状记”,《新民丛报》, 总第 49 号, 第 105 - 108 页; 总第 50 号, 第 89 - 92 页. “英国留学生之苦况”,《新民丛报》, 总第 53 号, 第 111 - 116 号.
- [13] “东京留学生四川学生为川汉铁路事敬告全蜀父老”,《新民丛报》, 总第 58 号, 第 95 - 109 页.
- [14] “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新民丛报》, 总 63 号, 第 81 - 88 页.
- [15] 饮冰室主人美国华工禁约记 [M]. 广智书局, 光绪三十年. 21 - 24.
- [16] 阿英认为该书“在不少地方歪曲了事实真相, 将美国政府迫害华工的责任撇开, 在某些地方起了为敌张目的作用, 甚至丧失了应有的民族尊严.” 参见阿英: “关于反美华工禁约的文学”载阿英编:《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 第 25 页. 这种评价明显有夸大其词之嫌.
- [17] 梁启超. 海外殖民调查报告书. 饮冰室文集类编 (下) [M]. 东京: 帝国印刷株式会社, 明治 37 年. 639 - 647.
- [18] 梁启超. 敬告留学生诸君. 同上书 (上). 713, 718.